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黄志钢 刘霞辉

内容提要: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分别对资本投入型、劳动投入型、效率驱动型、消费需求拉动型等增长路径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路径要么难以为继,要么是过去时或将来时,而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实质上也是一个附带市场检验理性约束条件的投入型增长路径。“新常态”下我国增长路径选择仍须回到资本投入型,但绝非重蹈覆辙,而是要走出一条我们称之为效率资本投入型的增长路径。

关键词:新常态 增长路径 效率

一、引言

近30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市场化取向的渐进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也的确将中国经济推入了“起飞”跑道。尽管成就非凡,完成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增长始终未摆脱政府主导型模式。回顾该模式下高增长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大量资本、土地、矿产等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低价工业化”阶段;二是在土地垄断及土地财政激励下,各级政府改造、扩张城市建设的“高价城市化”阶段。毋庸置疑,两个阶段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也引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积累了诸多问题。其中,尤为不利的是,在政府强势推动下,这“一低一高”的交叉互动及其巨大惯性下的路径依赖,也几乎将政府主导型模式推向了极致:不仅土地、资源和环境已难以承受,内外失衡、产能过剩、城乡不平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积重难返,而且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出现,“人口红利”、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消失,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外贸依存度高的经济增长以沉重打击;而随着城市化扩张,也引致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形成,由于服务业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产出增长速度较低,服务业比重扩大也易将增长导入结构性减速通道。如此,多重因素的交叉、相互作用,已使政府主导型模式丧失了活力与动力。此模式下多年高增长后的增速回

落,预示着我国经济运行将迈入新阶段。对这个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新常态”,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新常态”的提出,表明我国经济运行进入到一个重大的变革期、调整期已成共识。为此,原有增长模式势必随之转变,适应“新常态”的新增长路径也势必要形成,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

要探讨“新常态”下新增长路径的形成,必须先大致了解一下“新常态”经济运行之现状、阶段性特征及面临的困境,因为这既是新增长路径形成的基础,也是其起点。

(一)“新常态”出现的原因:“三大红利”的消失

所谓经济运行的“新常态”,可理解为:相对先前态势,其最大特征是GDP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总体的、最显现在外的现象。引发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从三大方面来概括,套用一下“红利”概念,即:“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与“政府主导型模式红利”的丧失。

“全球化红利”消失是指,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变局,将全球经济推入了全面调整的新时期。贸易保护主义重启,全球储蓄—消费格局以及国际资本集聚方向都发生

* 黄志钢、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hzg710711@163.com,liu_xh@cass.org.cn。

重大改变,使得多年来,对外资与外贸依存度高的我国经济增长,顿失一个核心动力。可以说,未来我国很难再现加入 WTO 最初 10 年的“全球化红利”对增长的强劲推动作用。

“人口红利”消失是指,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出现了拐点。2011 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 74.4%,10 年来首次下降,社会抚养比在 2010 年达到顶点,而各地“民工荒”现象,也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我国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基本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要素成本进入上升阶段,预示着过去低廉劳动力价格下驱动形成的“世界工厂”优势不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将遭受挑战。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前提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将会直接降低未来潜在增长率,牵引经济增速下行。

至于“政府主导型模式红利”,表现为 30 多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发展,催生出了“中国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等。我国政府具有控制力强、动员力强、推动力强的特点,在政府——国企——国有银行“三位一体”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下,通过“一低一高”的非均衡赶超型增长,奠定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地位。当然,也正因为“强势”,所以不易“收敛”。“三位一体”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本质具有扩张性、垄断性与粗放性特征,尤其是各地各级政府间的竞争,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引生出大量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分割、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过度投资等问题。这些负面效应的积聚,导致“政府主导型模式红利”的丧失。具体说,这体现在一系列“红利”消失上:如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低廉的自然资源、土地价格优势消退,“资源红利”不再,若综合“人口红利”,即“要素红利”消失;由于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使这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产业萎缩,即“投资红利”消失;此外还有“体制改革红利”的消失。显然,从农村改革开始,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再到国企和银行改革,财税、价格与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以及一系列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突破,释放了巨大的体制改革红利。但在此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出现了严重的“越位、缺位与错位”,“三位一体”模式强化各级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加剧了市场扭曲,使得先前增量改革、扩张市场的体制转轨红利消失,而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化的“三位一体”模式本身的改革。

(二)“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特征

对于“新常态”的经济特征,当前似乎已成共识:即中国经济进入了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其中,中高速增长是核心特征。应该说,在一系列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换挡减速是必然的。如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将降低潜在增长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已难承受粗放增长的过高速度;要素成本上升,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市场风险等决定了高投资难以继;在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外贸外资红利消失,也弱化了前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拉动力。至于“优结构”,则涉及多重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上,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结构上,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将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通过这些结构变迁,促进先进生产力产生、扩散,推动一系列新增长点的涌现,同时逐步淘汰产能过剩行业。所谓“新动力”,即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多挑战”,是指存在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这些在高增长过程中被酝酿但又被潜藏的风险,将会随着增速放缓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等,且这些风险相互关联,某个点的爆发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以上对“新常态”特征的概括,充分体现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阶段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主要矛盾、重要目标及可能困境。当前,主要任务是如何找到适合的增长路径,实现既可维持 GDP 中高速增长,又能有效防止并逐步化解各项风险,寻找与开拓新红利空间,逐步推进“优结构、新动力”特征的确立,促使“新常态”成为稳态。

三、“新常态”下增长路径比较分析

经济增长是一个要素投入推动与产出需求拉动的过程。有投入无产出,则无增长;有产出无需求,仅为一次性增长;若要素投入与产出需求不匹配,则增长不可持续;只有二者相互配套、互相促进的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对于增长路径,从要素投入与产出需求来分析,显然更为全面。以下,将结合二者,来分析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路径。

(一)供给端的三种增长路径

对于供给端的要素投入增长路径,通常以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来分析,标准形式为,包括资本 K 、劳动 L 及技术进步三因素。由此, $Y = AK^\alpha L^{1-\alpha}$ 依照增长对各因素投入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形成资本投入型、劳动投入型和效率型增长路径。为了比较各路径的增长效果,本文通过一个简单测算来表现三种增长路径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将之与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对比,以显示这些路径的可选择性。

至于潜在增长率,我们曾运用基于人口、就业因素实际产出的恒等式分解方法,将 1985—2030 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1985—2007 年、2008—2012 年、2013—2018 年与 2019—2030 年,以前两阶段为基础,对后两阶段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测算结果是 2013—2018 年平均为 7.87%, 2019—2030 年平均为 6.9%, 并认为依据此恒等式变换所推算的实际潜在增长率不仅是高位的,且可能是高限的^①。

1. 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资本投入型,即资金、资源与土地等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贡

献的增长路径。通常也称投资驱动型增长,是我们最熟悉的路径。正如前文所言,在此路径上,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等资源,先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激励工业化大发展,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推动城市化大发展,将我国经济推入了“起飞”跑道,完成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这“一低一高”两种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的交叉作用,积累了经济结构失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环境和资源制约、城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使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难以为继。而这正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无视这些日益扩大的矛盾,继续粗放式高资本投入增长路径,在 2008—2012 年基础上继续维持高达 30% 的净投资率,结果将是投入的增长效应大幅下滑。我们通过一个简单测算可以验证上述论断,估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资本投入型增长的效果

	历史 1985—2007	现状 2008—2012	预测 2013—2018	预测 2019—2030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10.02%	9.63%	5.27%	3.2%
(2)资本投入(K):弹性	0.62	0.55	0.45	0.40
(3)贡献份额=[(2)×(8)]/(1)	69.92%	71.05%	76.9%	78.1%
(4)劳动投入(L):弹性	0.38	0.45	0.55	0.60
(5)贡献份额=[(4)×(11)]/(1)	5.73%	1.75%	-6.9%	-13.1%
(6)tfp:增长率	2.44%	2.62%	1.58%	1.90%
(7)贡献份额=100-(3)-(5)	24.35%	27.20%	30.0%	35.0%
因素细分				
(8)资本投入增长率($k=dK/K$)=(9)×(10)	11.30%	12.44%	9.0%	6.25%
(9)(净)投资率(I/Y)	21.32%	35.55%	30.0%	25%
(10)资本效率(Y/K)	0.53	0.35	0.30	0.25
(11)劳动投入增长率($l=dL/L$)=(12)+(13)	1.51%	0.38%	-0.66%	-0.71%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rho o p_l$)	1.58%	0.93%	-0.01%	-0.01%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θ_L)	-0.07%	-0.55%	-0.65%	-0.7%

表 1 中,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资本效率与资本弹性的负面增长效应影响下,单纯提高净投资率已无法有效支持 GDP 增长。尽管资本贡献份额比前阶段提高 5 个百分点,达 76.9%,且 TFP 贡献率也由先前的 27% 增到 30%,但经济增长率仍将下滑 4.4 个百分点,为 5.27%。倘若此趋势继续延伸,在 2019—2030 年,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到 3%。此时,尽管资本贡献份额高达 78%,TFP 贡献率也进一步增达 35%,但由于资本效率的损失,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不可逆转的负向增长效应将被放大,由一

6.9% 扩大到 -13%。这意味着,粗放型投资驱动路径不仅无法有效提高增长率,也无法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逆转的不良态势,反而进一步放大其增长负效应。此外,若分别与 2013—2018 年的 7.87%、2019—2030 年的 6.9% 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可发现其差距将由 2.6% 扩大为 3.7%,实际上已证明该路径的不可持续。

2. 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如果说,资本投入型是工业化阶段主要的增长路径,那么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更多是小农经济,或工业化早期劳动密集

型产业为支柱时的主要增长路径。如我国劳动投入年均贡献率在 1986—1990 年曾占到 42.85% 的比重,此后下降趋势明显,从 1991 年开始年均贡献率均不到 9%。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与深入,资本投入就会逐步替代劳动投入成为主要增长路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据我们测算,2008—2012

年间,我国年均劳动投入增长率已由先前的 1.51% 降到 0.38%,而随着劳动人口数量减少,2013—2018 年、2019—2030 年将会分别降至 -0.66% 与 -0.71%,如表 2 所示。鉴于人口“红利”消失的客观事实,对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此路径已无须考虑。

表 2 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历史 1985—2007	现状 2008—2012	预测 2013—2018	预测 2019—2030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10.02%	9.63%	3.34%	2.4%
(2)资本投入(K):弹性	0.62	0.55	0.45	0.40
(3)贡献份额=[(2)×(8)]/(1)	69.92%	71.05%	80.8%	83.3%
(4)劳动投入(L):弹性	0.38	0.45	0.55	0.60
(5)贡献份额=[(4)×(11)]/(1)	5.73%	1.75%	-10.8%	-17.8%
(6)tfp:增长率	2.44%	2.62%	1.0%	0.84%
(7)贡献份额=100-(3)-(5)	24.35%	27.20%	30.0%	35.0%
因素细分				
(8)资本投入增长率($k=dK/K$)=(9)×(10)	11.30%	12.44%	6.0%	5.0%
(9)(净)投资率(I/Y)	21.32%	35.55%	20%	20%
(10)资本效率(Y/K)	0.53	0.35	0.30	0.25
(11)劳动投入增长率($l=dL/L$)=(12)+(13)	1.51%	0.38%	-0.66%	-0.71%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ρ_{pi})	1.58%	0.93%	-0.01%	-0.01%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θ_L)	-0.07%	-0.55%	-0.65%	-0.7%

表 2 假设 2013—2018 年,投资率回落到 2007 年以前 20% 左右的水平,但资本效率并未得到改善,资本弹性继续下降,都同于表 1 水平,TFP 贡献率也如此。由此,在无资本因素有效支撑下,增长率将会因客观的人口“负利”效应,更快下滑至 3.34%。此趋势若继续,在 2019—2030 年,即便净投入率仍维持 20% 的水平,由于人口负面因素进一步加大,增长率最终将会徘徊在 2.5% 的水平。显然,无资本支撑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在工业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表 2 还仅是涉及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若再考虑没有资本支持下实体经济衰弱而引发的大量失业因素,该路径的增长率可能还要再下降 1 个百分点。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该劳动投入主要是指普通劳动投入而非知识型劳力,当前的“民工荒”即是如此。而人力资本投入侧重在知识投入,一般表现在效率型增长路径,更多体现于城市化、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形成过程中,是推动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源泉。后工业化阶段,大力发展服务业,必须依靠人力资本的知识推动,促使服务业形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才能进入新阶段。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传统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已成历史,以人力资本主导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方是时代主流。

3. 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其贡献份额超过 50% 的增长路径。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其增长率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通常认为有三个来源:即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效率型增长的源泉在于知识投入,人力资本的涌现,扮演着关键角色。通常,已实现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的发达国家,TFP 贡献份额都在 60% 以上,而我国 TFP 贡献份额大约维持在 1/4 的水平,TFP 增长率年均约为 2.5%,表明我国还远未迈入效率型增长路径。

对于仍处于“干中学”模式下的发展中国家,TFP 增长来源主要依赖国外技术设备带来的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及较大投资规模,这使得我国 TFP 增长与高投入有较大关联。

由图 1 可知,我国 TFP 增长率随着净投资率变化,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也可看到,从 1985 年来,每当投资出现下降时,TFP 增长率反而升高,即 TFP 波峰是与净投资率波谷大体相对应。2007 年后这种态势出现了变化,TFP 增长率变化平稳,但净投资率却直线上升,而此时正是效率损失最严重的阶段,故推测 TFP 增长率拟合值应有所偏高(趋

势如虚线所示)。这一点,与张军(2013)估计比较一致。即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以减速趋势被动地回应了外部冲击,而且可以猜测,过去5年TFP应该有更显著的减速。以日本为例,在1971年尼克松冲击(日元汇率升值)和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的影响中,一些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增长核算工作曾经发现,日本GDP增长率急速下降时,其TFP的确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状况表明了“干中学”模式下TFP增长的脆弱性,一旦有外部冲击,TFP驱动效应就明显下降。故我们判断,随着“全球化红利”消失,当前我国“干中学”模式效应必将下降,再加上高投入规模效应不再及效率改善不利的变化趋势,若TFP不能在自主创新、生产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模式下实现增长,TFP增长率将会持续下降。反之,假使我国自主创新水平能提高,TFP贡献份额有显著上升,则会出现令人欣喜的增长局面。

人欣喜的增长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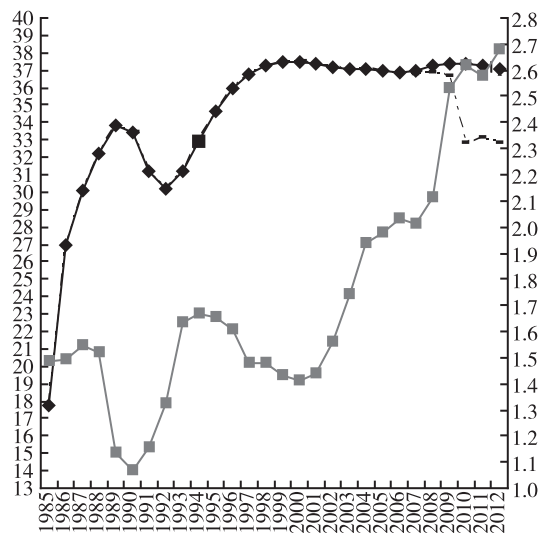


图1 1985—2012年TFP增长率与净投资率的变动趋势

表3 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的两种情形

	预测 2013—2018	预测 2019—2030	预测 2013—2018	预测 2019—2030
	资本效率未改善情形		资本效率改善情形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6.0%	3.9%	8.1%	8.0%
(2)资本投入(K):弹性	0.45	0.40	0.5	0.45
(3)贡献份额=[(2)×(8)]/(1)	56.0%	50.9%	54.0%	45.0%
(4)劳动投入(L):弹性	0.55	0.60	0.5	0.55
(5)贡献份额=[(4)×(11)]/(1)	-6.0%	-10.9%	-4.0%	-5.0%
(6)tfp:增长率	3.01%	2.34%	4.05%	4.8%
(7)贡献份额=100-(3)-(5)	50.0%	60.0%	50.0%	60.0%
因素细分				
(8)资本投入增长率($k=dK/K$)=(9)×(10)	7.5%	5.0%	8.75%	8.0%
(9)(净)投资率(I/Y)	25%	20%	25%	20%
(10)资本效率(Y/K)	0.30	0.25	0.35	0.40
(11)劳动投入增长率($l=dL/L$)=(12)+(13)	-0.66%	-0.71%	-0.66%	-0.71%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ρp_i)	-0.01%	-0.01%	-0.01%	-0.01%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θ_L)	-0.65%	-0.7%	-0.65%	-0.7%

表3测算了资本效率改善与否的两种情形。假设投资率分别回归到较理性的2013—2018年的25%与2019—2030年的20%,不再是投资驱动型30%的水平。在资本效率未改善情形下,资本效率、资本弹性与前两种情况一致,在TFP贡献份额分别为50%与60%的时候,在2013—2018年与2019—2030年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6%与

4%左右的水平。这显然要高于前两条路径的测算值,而TFP增长率要在3%的水平上,虽难度较大,但增长驱动效应非常明显。若再锦上添花,资本效率能够一并得到改善,也无须改善太多,只要回到甚至比2007年前还要低0.35~0.40的水平,在投资率为25%的水平上,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将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率重回8%以上,并且在投资率为

20%的水平上,2019—2030年仍可维持8%的水平。这种情况似乎过于理想,因为回到8%以上的增长率,意味着突破了2013—2018年平均为7.87%和2019—2030年平均为6.9%的潜在增长率水准。这个突破其实也表明人口“负利”虽是客观情况,但人力资本作用的充分显现,将能够跨越该“负利”陷阱,激发潜在增长率;由此也反衬出无效率的资本投入无法应对人口“负利”陷阱。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资本贡献份额越高,人口“负利”反向增长效应越大,而在资本效率改进下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人口“负利”的反向效应基本维持在-4%到-5%水平。

虽然效率型增长路径的确很具魅力,但真正实现却是一个高难度挑战。因为这要求TFP年均增长率要在3%~4%的水平上递增,从而实现由“干中学”到“自主创新”模式的转型。这不仅需要大批人力资本投入,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的保证,更需要一定的时效来达成。

(二)需求端的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

从需求端出发,通常概括为投资、消费、净出口三种需求。鉴于当前外需不振,只能尽量争取扩大,故此主要分析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样,依照需求拉动贡献率的大小,有所谓投资需求拉动型与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

鉴于投资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本质上具有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性质,二者是直接的对应关系,无须单独探讨,这里重点探讨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

消费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消费品的需求,主要指针对人们吃、穿、用、服务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最终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启动以个人收入为杠杆,基本职能是为生活服务。从现实国情看,多年来正是由于过度投资挤占了居民消费,使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需求不足,如图2所示。

因为消费需求要拉动增长,必须先经过市场检验,在生活品被消费之后,引发企业后续投入,方能成就拉动效应,具间接引致特点。由于我国消费率水平低,具有广大增长空间。图2中,我国50%以上的投资率及40%左右的居民消费率,55%左右的最终消费率,相比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消费率高达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消费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

首先,由于消费需求对拉动增长的间接引致特点及其消耗性特征,加之收入对消费具有决定性意

义,是收入变化决定了消费变化,也就决定了无法用生产函数测算收入的框架来直接分析该路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供求两端路径的分析是完全割裂开的。投资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与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有直接对应关系,故对其分析可直接通过后者来观察。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则与劳动投入型、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有间接对应关系,对其分析可间接借助后者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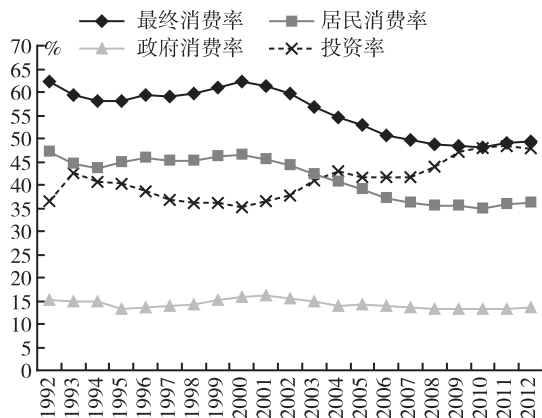


图2 1992—2012年几类消费率与投资率变化趋势

之所以说其有间接关系,是指无论劳动投入型还是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都主要依赖劳动力,不过前者主要是普通劳力,后者是知识型劳力,即人力资本。这种依赖,也决定了二者增长成果必然要向劳力倾斜,直接就体现在收入分配的倾斜,而收入对消费具有决定作用,故无论是劳动投入型还是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其实同时也就是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如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就既是劳动投入型,也可谓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当前,发达国家就是效率驱动型与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的结合体。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则是拉美,就如我国一样,先前走了劳动密集型加工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后来大量普通劳力又投入于服务业中,第三产业比重高达60%~70%,消费率也高达70%~80%,无疑这是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但也始终未跳出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观我国,在走了一段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后,进入了高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这无疑是正确的。此阶段收入分配自然会向资本倾斜,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趋弱也是必然的,且其趋弱程度与投资集中度成正比,即投资量越集中于少部分主体,消费需求拉动的趋弱程度越大。但遗憾的是,在这个高投资的“干中学”阶段,一方面我国并未

有效地向知识型投入逐步转型;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高投资,从重化工业又转入了房地产,导致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走入“死胡同”,同时也极大弱化了消费需求拉动效应。

通过前面测算,我们知道对当前我国而言,传统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已成历史,而效率型增长路径还路途较远,或如拉美,大量普通劳力进入服务业,来成就一条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等待的则是“中等收入陷阱”。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并不是一个可直接追求的目标,其间接引致增长的机制,决定了该路径处于附属地位,必须从属于、依附于某一供给端的增长路径,作为该供给端路径的结果,并不存在独立的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因为,增长直接取决于投入,消费只是间接影响,且消费能否拉动增长,最终还要看能否引发投入。

其次,也由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间接引致特点,即使消费率提高,也并不能一定保证持续增长。如在产品过剩时,消费仅是削减库存,就难以引致新一轮投资。从现实看,由于此前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几乎走到极致,也加大了当前国情下消费需求拉动增长的难度。这可以通过分析其引发拉动效应的两个前提条件——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得到验证。

消费能力主要通过收入水平来体现。从国情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虽逐年上升,但差距却呈发散态势,表明增长成果越来越不为普通城乡居民所分享,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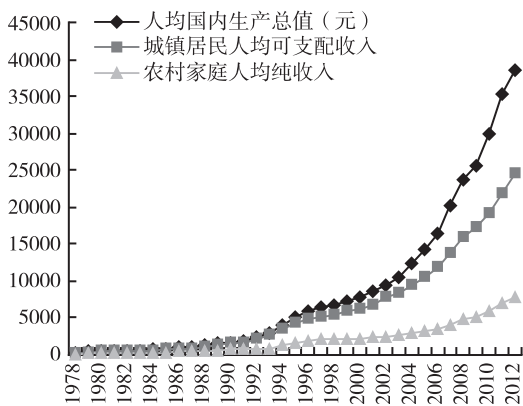


图3 1978—2012年中国三种收入变动趋势

同时,无论是城乡内部及城乡之间收入分化也趋于严重,尤其是城乡之间,基尼系数已超过0.45,三种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

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的信息更

加惊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低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财富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差异,表明我国有更广大民众消费能力相对不足,也意味着该路径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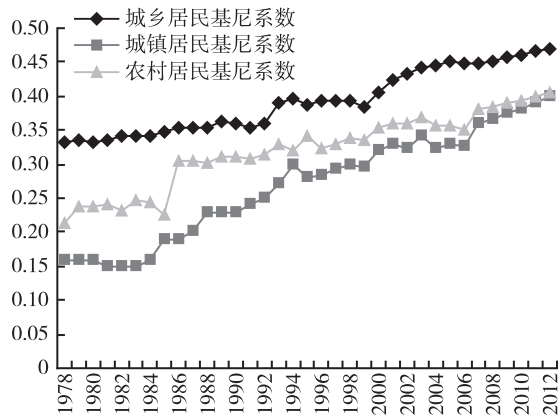


图4 1978—2012年三种收入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至于消费意愿,可由消费倾向显示,我国城乡消费倾向都呈下降态势(见图5)。消费倾向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与居民收入提振消费相比,并非那么单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能立竿见影提高居民收入,虽有可能但并不必然提高消费需求。若不能相应提高消费倾向,所增收收入被储蓄,同样难以实现消费拉动增长。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涉及更广泛的改革,除了收入分配,还包括食品安全、假冒伪劣等消费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众多问题。因此,要实现消费拉动增长,就必须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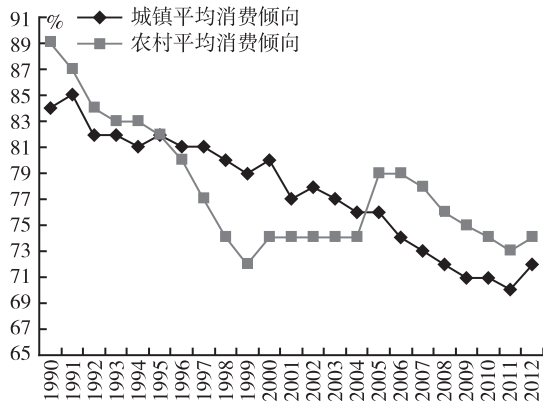


图5 1990—2012年城乡平均消费倾向变化态势

再次,当前国情下,如果人为促成该路径,也会导致负面效应。其中,收入是一个关键变量,收入提高是一柄“双刃剑”。由于收入同时也是企业成本,不恰当的高收入会导致“工资侵蚀利润”,弱化再投资能力,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如此,即使消费力提高,但却降低了企业继续投资的意愿与能力,最终也失去了增长的根本。考虑到我国大部分就业为民企所吸纳,一味强调收入提高,会对本来已步履艰难的民企雪上加霜,导致失业增长。再者,依照当前国情,工资怎样涨,可能都难以根本削减普通居民生活负担及提高消费意愿。因为资产价格的高涨、房产、医疗、教育等费用的高企带给居民生活压力已非涨工资所能释放。要真正促成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除了适度增加收入,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外,还必须从高涨的资产价格入手,从打破垄断着手,通过挤压资产泡沫,消除垄断高价,实施转移支付,改善居民福利,来提高消费意愿。

复次,“新常态”下的重要经济特征就是经济增速换挡,在此经济减速与结构调整期,失业问题、未来不确定性问题必将更加凸显。这无疑会进一步扩大我国居民本已存在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不足的负面效应,更加大了消费需求拉动增长的难度。因此,消费需求拉动增长虽很诱人,但在“新常态”下,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选项,实际上不仅难以实现且潜藏风险。

最后,就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路径的本质看,不过就是一种经过了市场检验后的再投入型增长路径。“三驾马车”需求拉动,是事后统计的结果,是将先前投入结果区分为三个方向,而实际上增长的本质在于投入。消费需求如何,仅是构成了对先前投入品质的市场检验。若先前投入的产出,经过了市场洗礼,产品被市场消费了,则表明了投入的有效性、正确性与可持续性。故强调消费需求拉动,实质在于对投入型增长路径附带一个市场认可的理性约束条件。通常,对有资金约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参与公平竞争,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而言,这是必然的投资取向。从事后看,也就形成了消费需求拉动增长的现象,当然也表明这是市场效率较高的投入驱动型增长。

多年来,我国在政府主导模式下“三位一体”的投资取向和投资行为,常常忽视消费需求的制约,热衷于重化工业内部循环投资及房地产业投资,导致我国投入结果与消费需求渐行渐远。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剩,直至当下增长乏力。因此,要探讨“新常

态”下增长路径的选择,就必须回到投入来探寻。虽然,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突飞猛进,但无论工业化或城市化都仍未完成,而农业基础建设薄弱也需大力投入。当然,要回到投入型增长路径,这也应是既可维持合理增长,又可推进结构调整,同时也合乎市场效率的增长路径。

四、“新常态”下的选择: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率高达70%,从连续性与增长惯性上看不易转型,否则很可能导致停滞,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因此,重新审视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是必须的。

要重申资本投入,就不得不返回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并进一步分析资本因素的构成。同样从标准生产函数 $Y = AK^\alpha L^{1-\alpha}$ 出发,经数学变形,则对应的标准增长核算方程为:

$$\dot{Y}/Y = \dot{A}/A + \alpha \cdot (\dot{K}/K) + (1-\alpha) \cdot (\dot{L}/L)$$

该式表示:GDP增长率=资本弹性×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弹性×劳动投入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其中,资本投入增长率=净投资率(I/Y)×资本效率(Y/K)。

可见,对于促进增长,资本因素涉及三变量:资本弹性、资本效率与净投资率。过去高投入增长,由于过分重视净投资率的攀升,使资本投入型增长难以为继。显然,“新常态”下,在维持合理净投资情况下,需要从资本弹性与资本效率两个变量入手,探寻新的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一)资本产出弹性

资本产出弹性的最基本含义,是指产量变化率对资本投资变化率的反应程度。在工业化或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阶段,资本效率是资本弹性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当净投资变化率很大,但产出增加率变小一定是资本效率低下地结果。而资本弹性自然就下降,反之则反。图6给出了两者变动趋势有较高的一致性。

此外,资本弹性相对变动趋势也与劳动弹性有关,即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相关。若收入向资本倾斜会加大资本弹性,若劳动份额通过国民收入提高而提升,资本弹性将相对下降,由此也一定程度表明了劳动收入提高的“双刃剑”效应。故当前阶段,应合理导引劳动收入提高,通过改革,循序渐进、多渠道地提升消费需求拉动效应。否则,若实行强制性收入分配倾斜政策,而使低附加值低素质劳动力获

得与之贡献不相称的国民福利提升,就会人为压低资本弹性,增长将很易进入减速通道。如此,不仅会弱化投入增长效应,也易引发通货膨胀。当然,随着进入城市化服务化阶段,净投资率下降及人力资本附加值提高,势必导致劳动投入弹性增加。此时尽管提升资本效率仍会提高资本弹性,但已难抵挡劳动弹性上升势头,资本弹性相对下降也会是一个必然趋势。鉴于当前阶段,资本效率是资本弹性的决定性因素,且二者有较一致的变化趋势,这就意味着,可单从资本效率角度来考虑新的资本投入型增长,打造一个有效率的资本驱动路径。如果说,依赖高投资率驱动的,称为高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那么以资本效率提升为前提条件的,则姑且称之为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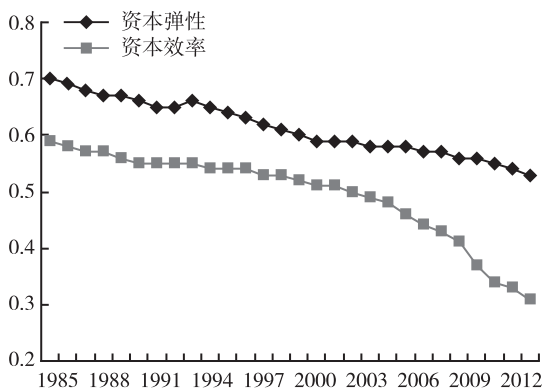


图6 1985—2012年资本弹性与资本效率变动态势

(二) 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的测算效果

在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上,净投资率将回归到较理性的25%,而资本效率由前阶段的0.35提高到0.38,相应地,由于资本效率改进的支持,资本弹性将回升至0.57;同时TFP贡献份额也将大致维持在30%,如此,2013—2018年,GDP增长率将会上升至7.4%,接近7.87%的潜在增长率。若经济继续沿着资本效率改进路径运行,那么2019—2030年,资本效率继续上升至0.43,净投资率再继续降低5%情况下,即使资本弹性降至要素弹性逆转的临界点0.5,此阶段GDP增长率也将会达到6.45%,同样接近6.9%的潜在增长率。显然,与1985—2007年的0.53相比,资本效率提升至0.38或0.43是可以实现的;而2013—2018年资本弹性由0.55仅上升至0.57,只要不强制实施分配政策,人为快速提高劳动弹性,资本效率提升引致资本弹性回升也是一个自然结果,具体如表4所示。

显然,与前几种路径的测算情况相比,效率资本

投入型增长路径的测算值,最令人满意。当然,这不能与资本效率改善情形下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8%的增长率测算值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情形下人力资本作用的充分显现,实际上激发并提升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再加上资本效率的改进,这即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进入到一个理性的、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的新轨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资本效率未改善情形下的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6%的测算值相比,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的测算值仍是高的,且二者差距越来越大,由2013—2018年的差距1.4%,到2019—2030年的2.5%左右。这其实表明,虽然资本效率改善与TFP效率驱动都是增长率提升的主要方式,但在当前我国经济状况下,显然前者更为重要,提升效果也更佳,当然也就更为迫切。而TFP效率驱动功效的发挥,首先需要提升资本效率来支撑,如此,我国经济才有可能再次步入8%以上的增长历程。而这种高增长必将是集约式的、结构均衡的、可持续性的理想增长路径。图7为几种增长路径的测算状况结果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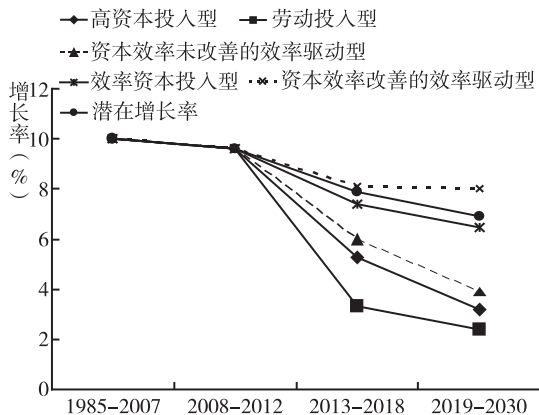


图7 经济增长路径的比较

由图7,在资本效率未能提升时,不管是高资本投入型、劳动投入型,还是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的结果,都与潜在增长率渐行渐远,并有相互趋同态势,此即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若无法改善资本效率,即使TFP贡献份额达到50%以上,都难阻止经济增长逐步下滑以及与潜在增长率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也意味着TFP增长的驱动效应将会被低下的资本效率所抵消。反之,在资本效率提升下的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则将会逐步趋近我国经济的潜在水平,两阶段测算值与潜在增长率的差距也呈收敛态势。而在此基础上,若TFP贡献份额能逐步上升,达到50%左右时,经济将会突破人口“负利”限

制,提高潜在增长率,进入到8%以上的增长区间。由此,也凸显了资本效率提升对促进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首要的、关键性的作用。而之所以如此,实在是

导致资本效率下滑及阻止其提升的因素,正是困扰与束缚我国经济良性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我国一系列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所在。

表4 资本效率提升的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历史 1985—2007	现状 2008—2012	预测 2013—2018	预测 2019—2030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10.02%	9.63%	7.4%	6.45%
(2)资本投入(K):弹性	0.62	0.55	0.57	0.50
(3)贡献份额=[(2)×(8)]/(1)	69.92%	71.05%	73.2%	66.7%
(4)劳动投入(L):弹性	0.38	0.45	0.43	0.50
(5)贡献份额=[(4)×(11)]/(1)	5.73%	1.75%	-3.7%	-5.5%
(6)tfp:增长率	2.44%	2.62%	2.26%	2.5%
(7)贡献份额=100-(3)-(5)	24.35%	27.20%	30.5%	38.8%
因素细分				
(8)资本投入增长率($k=dK/K$)=(9)×(10)	11.30%	12.44%	9.5%	8.6%
(9)(净)投资率(I/Y)	21.32%	35.55%	25%	20%
(10)资本效率(Y/K)	0.53	0.35	0.38	0.43
(11)劳动投入增长率($l=dL/L$)=(12)+(13)	1.51%	0.38%	-0.66%	-0.71%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pop_t)	1.58%	0.93%	-0.01%	-0.01%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θ_L)	-0.07%	-0.55%	-0.65%	-0.7%

(三)选择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的意义

对于增长,尽管从投入与需求角度,可细分出多类型的增长路径,但自工业化铺开,应是资本投入型与效率驱动型(TFP)增长路径为主。通常,在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中,由前者过渡到后者,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中资本效率内化于资本投入过程中不断提升,而资本效率的逐步提升,实乃是为最终进入效率驱动型(TFP)增长路径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的过程。发达国家由资本投入型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资本效率不断提升功不可没;而拉美始终不能迈入效率型增长路径,也正是先前资本投入增长中,资本效率并无适时提升,难以促进知识性投入,导致跨入效率型增长路径所必须的条件与基础不足。工业化萎缩后,又转入发展吸纳普通劳力的服务业,由于没有效率支撑,仅停留于生活服务业,而非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退回到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可见,无效率支持的第三产业及消费需求的比重大,并不必然是一个经济体健康的表现。故当前我们必须正视与接受这个现实:即我国仍处于资本驱动增长阶段,只不过应进入以资本效率提升为核心的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当然,提出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实乃一种无奈。因为我国经济运行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下,资本效率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呈下降态势,难以进入创

新驱动的效率型增长路径。由此,该路径旨在弥补先前高投入增长的不足,推动资本驱动模式继续前行,并在资本效率提升过程中,扭转经济结构扭曲态势,化解积累的矛盾,为由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最终过渡到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搭建跳板。作为“新常态”下的新路径选择,这是其主要的意义与作用。

另外,此处的效率与效率驱动有所不同,后者更多在于技术进步与创新、人力资本等偏重于科技含量的效率;而资本效率更侧重配置、积累、形成及回报等资本流动过程中各环节的效率,与推进市场完善的联系更紧密。故以促进资本效率提升为核心的投入增长路径,有助于突破政府主导,推动经济运行向市场主导模式挺进。

由资本因素三变量看,资本效率是个枢纽变量。因为资本效率不仅是提高增长的直接因素,也是拉动资本弹性上升的决定因素,还是提升资本效率对知识投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会激发出人力资本的活力,不仅有利于减缓当下经济下行态势,也有利于为进入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在资本驱动仍是我国增长最主要贡献者的当下,以资本效率为标准,可避免投资的投鼠忌器心态。只要有助于资本效率提升的投资,就无需控制;而资本效率标准下的投入,也决定了其必然是符合

市场需求的、理性约束的投资,不仅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比例合理、量化适度的投资格局,且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

与技术进步、自主创新等难以把握的客观性高要求相比,资本效率提升具有相对的易操作性,可行性较强。因为其更多着力于资本的配置、形成等效率上,可充分发挥我国强政府的优势。只要各级政府真正面向市场,朝完善市场的方向努力,就能成为改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势推动者。此外,其可行性还体现在资本效率无须大幅提升,即可推进GDP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并且,资本贡献份额依旧占绝对比重的当下,通过提升资本效率,也无须大幅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即可达到70%以上。

由上,在资本驱动仍是我国增长路径的唯一选择及高投入难以为继的当下,以资本效率提升作为当前投资行为的标准,抓住了导引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从这个意义上,资本效率也可谓盘活整个经济大棋的枢纽性变量。

(四)资本效率内涵及其下降缘由

既然资本效率是枢纽性变量,那么认识资本效率内涵及其下降缘由是必须的。虽然上文的资本效率是以实际GDP/资本存量(Y/K)来衡量,但仅能反映单位资本实际产出变量的整体效率,而整体效率乃是资本配置、积累、形成及回报等资本流动过程中各环节效率的综合体现,故要全面探讨,就得从这些环节入手:

其一,资本投入总效率通常用资本一产出比(K/Y)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或其倒数产出一资本比(Y/K)与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即投资效果系数来表示。这些变量具有相同变动趋势。对于资本投入总效率,学界结论一致认为该效率是持续下降的,尤其2008年后更明显。导致其持续下降的缘由主要是:庞大的公共部门投资,即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低下。大量效率低、公益性强的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供水、能源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些公共产品一般具有非价格投资特征,不追求跨期最优结果,同时某些地方政府不断打造形象工程,对于居民福利水平和产能形成效率较低。此外,财政改革及其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降低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与银行大量信贷、技术创新能力缺乏等也是资本投入总效率持续下降的原因。

其二,资本配置效率,即资本在行业、地区或部

门的转移效率。当前,学者们大都借鉴 Jeffrey Wurgler(2000)的投资反应系数模型来衡量,结论也基本是资本在各部门、行业、地区之间配置结构失衡,资本配置效率低。具体表现与原因可归为:一是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私营工业企业远高于国有企业。二是国有银行信贷投放受行政命令影响多,较少关注资金回报率,因而大部分居民储蓄以低利率投至国有部门,造成非国有部门资本配置不足。三是资本省际配置严重失衡,资本在各省份之间的配置缺乏效率,区域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四是行业间资本配置上,除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行业外,资本配置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国家重点扶持或者政策倾斜的行业,如金属采选、烟草加工业、化纤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等。五是资本配置跨行业要优于跨地区。原因是资本跨行业转移主要由商品市场或者需求结构驱动,跨地区转移则主要由要素市场驱动,而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高度管制,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功能,造成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化差异,也造就了二者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六是产业间资本配置结构失衡,第二、三次产业资本效率都较差,第二产业 ICOR 在 2000—2008 年间保持在 3.0 左右的水平^③,2009 年后大幅提升,而长期以来第三产业投资效率比工业更差,ICOR 持续在 4.0~6.0 的区间里变化,原因是我国服务业相对第二产业有更低的劳动生产率。

其三,资本动态效率,或曰资本积累效率,通常以资本积累的黄金律增长模型或 AMSZ 准则来衡量。主要着眼于资本净收益的正负判断,资本净收益为正,则动态有效。此项研究由于划分时间段不同,学界结论有差异,但 2003 年后动态效率下降较快,目前已进入动态无效水平基本上是个共识。

其四,资本回报率,不论从宏观层面,如白重恩等(2007),还是微观层面,如卢峰(2007)都得到了中国资本回报率较高的结论,而宋铮(2011)的研究也支持了该结论。资本回报率高的很大原因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上大幅向资本倾斜所致,这是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的必然体现。

其五,资本形成效率,即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效率。孔睿、李稻葵等(2013)发现民营经济投资比重对资本形成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原因是民营经济相对国有经济更为弱势的地位,使其在融资、审批、土地等诸多领域面临更严重的困难。交易成本较

高,没有足额形成资本,产生了更多投资损耗,促成了我国资本形成效率的低下。

五、促进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形成的建议

要促进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形成,首先就要从造成资本效率持续下降的缘由入手。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政府要主动减少投资,对于必要的公益性投资要建立健全基础设施项目的科学评估与决策机制,同时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和工程质量审查机制,减少官员腐败,杜绝“豆腐渣”工程,提高资本形成率与回报率。

第二,减少行政干预,逐步放开要素市场的管制,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强调要素配置的价格机制作用,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真实反映企业效率,导引各产业部门以真实效率为衡量基准的均衡增长。

第三,建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的国有银行放贷、进行资本配置的评估指标体系,促进利率市场化,将资金导向效率较高的民企,改变“国国有钱无处花、民企有处无钱花”格局。降低民企融资成本,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民间金融改革步伐,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高效性。

第四,打破各级政府的行政分割与区域垄断,减少重复建设,破除国有企业不必要的行业垄断,减少国有企业等国有经济的市场参与度,建立低效企业出清机制,尤其是国有企业破产退出机制。

第五,消除政府制度性障碍,真正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拓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减少行政权力对民间资本的干扰、限制与束缚,减少民营企业各种公关开支,提升民间资本形成效率。同时,削减不必要的行业管制,容忍民间资本进入高层次服务业等利润丰厚领域,促使民间资本流向投资,而非炒作楼市、股市等投机市场。

注:

- ①关于四个阶段划分等具体分析以及本文以下测算表的形成,可详见黄志钢、刘霞辉,《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8期。
- ②《中国经济刺激措施成效不大》,亚汇网,2014年8月14日。
- 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日本,资本形成的ICOR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

参考文献:

- 黄志钢 刘霞辉,2014:《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经济学动态》第8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第10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 新常态,新在哪?》,《人民日报》,2014年8月4日。
- 张军,2013:《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财经网。
- 孔睿 李稻葵 吴舒钰,2013:《资本形成效率探究》,《投资研究》第4期。
- 韩学丽,2012:《论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贸导刊》第18期。
- 任保平 郭晗,2012:《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王维群,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投入的效率及其优化对策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向艺 徐英吉,2007:《劳动、资本及产业结构变动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析》,《山东经济》第6期。
- 刘树成,2013:《国民收入翻番难点透视》,《人民论坛》第4期。
- 白重恩 谢长泰 钱颖一,2007:《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较》第28辑,中信出版社。
- 卢锋,2007:《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经济学(季刊)》第3期。
- Song, Z., K. Storesletten & F. Zilibotti(2011),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202—241.

(责任编辑:钟培华)